


第七期

- 方言学的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刘丹青
- 关于“渠”和“个”·····张振兴
- 从汉语方言变音现象谈汉语的形态类型·····柯理思 太田斋
- 汉语方言语音弱化及其后果·····赵日新
- 福州官话与福州白话·····陈泽平
- 陕北晋语曾梗舒声韵白读[*ə]的相关问题·····沈 明
- 绥德方言“也”的零音节及其表现·····黑维强
- 山西沁源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白静茹
- 从几个常用词白读音看山西方言山摄白读·····薛志霞
- 山东方言的卷舌儿化·····高晓虹
- 苏北方言蟹止摄开口三四等的元音高化·····冯青青
- 鱼蚣、鹅蚣、牛蚣和农蚣：客赣方言遇摄白读音的
层次和分布·····魏钢强
- 19世纪以来客家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庄初升 李惠萍
- 赣东北徽语核心词共有率考察·····胡松柏 吴艳芬
- 试析徽语黟县碧阳方言长元音的音质·····栗华益 姚 军
- 湖南泸溪（梁家潭）乡话的否定词·····陈 晖
-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汉语河州话研究综述·····莫 超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方言学报

中国方言学报

第七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方言学报. 第7期 /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5360-7

I. ①中… II. ①全… III. ①汉语方言—丛刊
IV. ①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8895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ZHONGGUÓ FANGYÁN XUÉBÀO

中国方言学报

第七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360 - 7

2017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½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方言学的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	刘丹青	1
关于“渠”和“個”·····	张振兴	17
从汉语方言变音现象谈汉语的形态类型·····	柯理思 太田斋	27
汉语方言语音弱化及其后果·····	赵日新	49
福州官话与福州白话·····	陈泽平	62
陕北晋语曾梗舒声韵白读[*ə]的相关问题·····	沈 明	70
绥德方言“也”的零音节及其表现·····	黑维强	77
山西沁源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	白静茹	85
从几个常用词白读音看山西方言山摄白读·····	薛志霞	93
山东方言的卷舌儿化·····	高晓虹	101
苏北方言蟹止摄开口三四等的元音高化·····	冯青青	113
鱼蛇、鹅蛇、牛蛇和农蛇:客赣方言遇摄白读音的层次和分布·····	魏钢强	120
19世纪以来客家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	庄初升 李惠萍	134
赣东北徽语核心词共有率考察·····	胡松柏 吴艳芬	153
试析徽语黟县碧阳方言长元音的音质·····	栗华益 姚 军	161
湖南泸溪(梁家潭)乡话的否定词·····	陈 晖	174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汉语河州话研究综述·····	莫 超	182

方言学的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liudq@cass.org.cn)

提要 本文从科学作为一种立体网络系统的定性出发,指出方言学研究可以分为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两大类型。内向研究是方言学作为语言学内一门学科自身的本体研究或主体研究,以研究区别于共同语的复数意义上的语言地域变体为主要任务,包括方言学的界定和研究方法、各方言的特点、方言的分区、方言的历史来源这些核心领域。外向研究是那些以方言语料为材料和考察对象、以狭义方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学术需求和目标为指归的方言研究。方言学的外向研究既要采用内向研究的成果,也作为方言学与其他学科的连线对内向研究产生反哺作用。外向的研究范围极广,本文重点提及了面向普通语言学本体的方言研究,基于历史、地理、类型等跨语言视角的方言研究,面向人文社会学科的方言研究和面向应用的方言学科四个方面。本文强调方言学的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应当加强相互了解,避免以自身的学术目标来要求对方,让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互相尊重,相互受益。

关键词 方言学 内向研究 外向研究 立体网络

壹 方言研究科学定位的必要性

方言学是语言学中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语言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属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科学”一词,源自 science 的翻译。为什么当初会用“科学”一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汉语口语的跨方言调查与理论分析”的成果之一,初稿曾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 18 届年会暨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兰州)宣读。此次发表前做了修改。

词来翻译 science?

从字面上看,科学是分科的学问。20世纪初的《辞源》初版中,“科学”条开头是这样解释的:“以一定之对象,为研究之范围,而于其间求统一确实之知识者,谓之科学。”“对象、范围”,都表明科学的分门别类和专业化的属性。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学问不是科学,至多是前科学或潜科学。

但是,科学的要义不仅在分,而且在合。任何一个学科,必须在总体科学体系中占据一个位置,与其他学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沟通交流、互利互惠,形成合力,能共同推动科学整体的发展。科学整体上是个巨大的立体网络系统,每一个学科点都有很多条连接线与或近或远的相关学科点发生着直接间接的信息知识的交换,形成了很多交叉点。同时,这个网络系统又是动态的,随着新的学科加入进来会滋生出新的连接线和交叉点。画地为牢、封闭隔绝的学问,纵是“分科的学问”,却难以简称为“科学”。

汉语方言学是目前国内发展势头最强劲的语言学科之一。方言学会年会是国内语言学会议中报名人数最多的会议之一,很多语言学期刊、集刊收到的方言类稿件占比越来越大。研究方言学的专业人员,都比较清楚自己学科的范围和特点,注意对学科范式的遵守。但是,对于方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方言学和其他学科的多方面关系,未必人人都很清楚。这方面意识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方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种种内外联系受到隔绝,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难免受限,还可能跟其他学科、其他范式对方言的研究相互产生偏见误解,不利于学科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前进。因此,在方言学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节点,我们有必要对方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做进一步的厘清,以便于方言学工作者树立更加清晰的学科意识,有更加科学合理的学术追求,也能促使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加深了解,分工有序,互惠互益,用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代替相互隔阂和互生偏见。我们所担心的隔阂和偏见,并非杞人忧天的虚构,而是当前中国语言学生态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客观现实。

方言学的研究可分为内向和外向两大类型。内向型研究是方言学的本体研究,也是传统上人们理解的方言学研究的主体领域。内向型研究面对的是方言学自身的学科任务,是方言学之所以成为方言学、学科系统之所以需要方言学的那些基本任务。外向型研究是以方言现象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面向方言学的上位学科(语言学)、相邻学科和语言学之外的相关学科的方言研究领域或课题。这些是传统上注意得不够、而现在越来越呈兴旺态势的领域。下面我们分别对两种研究做一点分析。

贰 方言学的内向研究

从个人交际功能来看,方言就是一种语言,对只会使用方言的人群来说,例如一个只会说广州话的人,广州粤语就是他所能掌握和使用的语言的全部。我们不能说方言使用者是没有语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方言的确就是语言。詹伯慧主编(1991:5)指出:“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是方言学。”那么,方言作为研究对象,与语言有什么区别呢?方言是与共同语相对的,而共同语虽然也以一种方言为基础和标准,但它的社会功能已使它能够作为一种语言的代表。这样,作为方言学研究对象的方言,就有了两个重要特征:

(一)除了具有特殊地位的作为共同语标准的基础方言,单个的方言都不能作为整个语言的代表,而只能作为一种语言的一个区域变体而存在,是与共同语相对而言的。

(二)一种语言只能有一种共同语,因此共同语是“单数”的;而方言是“复数”的。

以上两个特征,决定了方言学的基本学科属性:

1. 方言学只研究不能作为全民族共同语的,与一定区域联系的语言变体,这使得方言学跟区域、地理关系特别密切;而语言学研究一种语言时,虽然跟地域有一定关联,但更大程度上是跟人的群体相关联。例如,说起汉语,我们主要想到跟中国人相关联,不管他生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而说起闽南话,我们总是跟闽南和台湾这些地方相关联,说起上海话,我们总是马上想到上海这个城市。

2. 方言学面对着许多个而不是只有一个语言符号系统。这是方言学区别于一般意义的语言学的更显著的因素。语言学在研究一种语言时,通常设定该语言是一个内部一致的符号系统,有时甚至表征为索绪尔所提出的著名公式:

$$1+1+1+\dots=1(\text{集体模型})。(\text{索绪尔著,高名凯译,1982:41})$$

这里等式左边的1是指同一社会中的不同个体头脑中的语言系统,等式右边的1是社会成员集体所拥有的语言系统,两者实际是等同的,这是有效交际的基础。而方言学面对的却是许多个系统,它的很多学科特点都是由此决定的。

方言学的以上基本属性决定了方言学所需要面对的学科任务。方言学的内向研究,就是围绕自身的学科任务而展开的研究。由方言学自身学科任务决定的方言学研究领域和任务主要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①方言学的界定和研究方法。不管是自觉形成的还有无意中自然形成的,作为一门学科,方言学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定位,如将方言特征和分区作为核心任务。方言学还要有与定位相配的研究方法。例如,研究方言离不开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离不开国际音标的帮助,田野调查必须有事先准备好的问卷蓝本,并需在现场物色到合适的发音合作人,必须有听音记音的能力。方言学研究语法必须以语音的调查了解为前提,不能跳开语音直接进入陌生方言的语法研究。方言学必须要进行对应关系的比较,包括跟共同语的对应关系、跟早期的共同源头语言(如《切韵》所代表的中古语音系统)的对应关系、跟相邻近亲方言的对应关系等。这些构成了方言这个专门学科的标志性方法特征。我们看一下方言学以外的学科,并不以这些为必要因素,有一些语言学者、甚至许许多多语言学者,一辈子没有做过田野调查,也有些学者对国际音标很不熟练,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研究,如语法的研究、词汇学词典学的研究和语文辞书编纂,语义的研究、音韵的研究,训诂的研究、修辞的研究等。

②各方言的特点。既然方言学面对的是“复数”意义的语言系统,就要找出每个系统的根本特点。在汉语中(在其他语言中也大致如此),最显著的方言特征体现在语音上,所以方言特征又简称为口音,其次才是词汇及语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方言研究最基础的部门是语音研究(包括音系学意义上的语音研究),为什么语音在方言学中的重要性和地位超过了语音在其他很多语言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因为不同的方言系统主要是靠语音系统相区别的。例如,是入声特征——不管是韵尾特征还是声调特征,还是仅仅是一种音系特征——区分了晋语和其他北方方言,李荣(1985)还提出入声调在现代方言中的调类分合方式可以用作区分官话区内各大方言的主要标准。全浊声母将吴语和其他周边方言区分开来,不管全浊声母的语音属性是所谓清音浊流还是带音的气声,全浊声母也是将老湘语和新湘语区分开来的语音特征,溪母字的擦音化成为粤语广府话的特征,如“科 fɔɿ | 开 hɔɿ | 去 hθyɿ | 坑 haŋɿ”(李新魁等,1995:168-203),而透母、定母平声和部分上声字的擦音化则成为四邑粤语的显著特征,如台山“拖 hɔɿ | 题 haiɿ | 艇 henɿ”(詹伯慧主编,2002:141)。入声以外的声调,包括连读变调,也成为方言区的重要特征,例如北部吴语主要采用首字调右向覆盖整个词语的变调模式,例如苏州话“江苏、江南、江水、江西省、江永县、江湖作风”都用同一个变调模式 55[44(33)]21。而其周边的其他一些方言如江淮官话及南部吴语等更常表现为后字影响前字的变调模式,如温州话:马路 moɿ ləyɿ | 地方 deiɿ huɔɿ | 胡须 vuɿ sɿɿ(潘悟云,1998:49-50)。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看到词汇、构词法和语法特点也会成为方言的深层次显著

特征。例如,一个“厝”字就表征了闽语的特点,带“圪”前缀的双音词语成为晋语和西北一些方言的特点,子后缀说成“得”或“唧”,分别成为赣语和湘语的特征。再如复数标记“们”的极其广泛的应用,就是兰州及其周边兰银官话的显著特征,例如(转引自黄伯荣主编,1996:19):

人们、娃娃们、姑娘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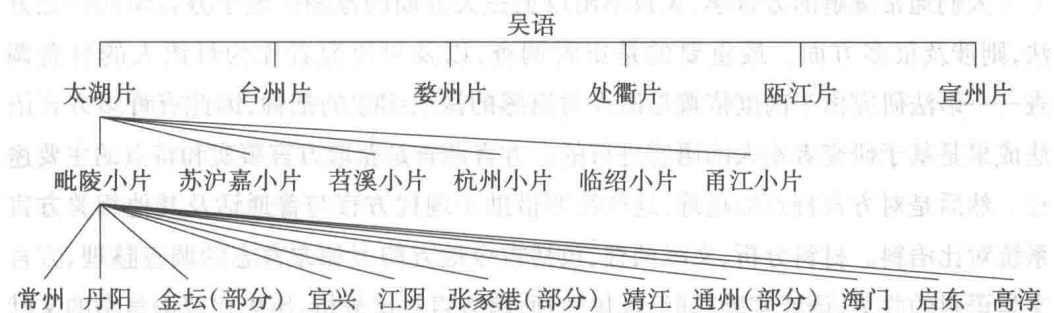
猪们、驴驴儿们、桌桌子们、旗旗子们、衣裳们、瓜们、树们、米们、水们、油们、肉们、香们~烧得雾沉沉儿的、钢们

句法上,“把/将”类处置式的不发达作为一个句法特征构成了粤方言的显著特征,而宾语前置的SOV语序占优势,则成为大量西北汉语方言的语法特征。比较句基准上不加标记、谓语上反而加标记“恰”则成为闽南方言独有的差比句形式,例如(陈法今,1982):

小弟大成紧,恰悬阿兄弟弟长得快,都比哥哥高了。

阿母恰想食婴儿妈妈比小儿子更想吃。

③方言的分区。由于方言跟区域属性的固有纽带,方言之间需要在地理维度上划分出界线。对于汉语方言这么复杂的集群来说,单一层次的分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方言分区还必须由大到小地分层次划定,形成一个共时平面的多分叉树形图结构。例如:



方言分区及其进一步的精细化、科学化、合理化,是方言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精细化,是要求精确,充分反映方言的层级系统及每个层级的共性及区别性特征。科学化,是要求分区基于统一的分类标准,具有内在逻辑。合理化,就是分区结果要符合当地人和周边人群对方言区划的语感和认同。汉语方言的分区经历了从粗到细、从印象式分区到有精确标准的分区的漫长进程,从扬雄《方言》算起,跨度约两千年。汉语方言区划基于科学方法的大致定型,是在《中国语言地图集》项目下促成的、在李荣先生主持下构建的汉语十大方言的分层区划系统,后经地图集第二版若干修订。

这是20世纪80-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项重要专业化成果,已产生重要影响并且长期惠及学界和社会。高水准的方言分区实际上汇聚了方言调查研究众多成果的精华,方言分区标准的选择和权重分配,本身就是对已有方言调查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成果。方言分区的结果,具有丰厚的学术含量,也因此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和社会功能。不但想要从事方言研究的人的必备参照,而且语言学内外对方言概况的了解需求都绕不开这些区划。当然以汉语方言之复杂及不断变迁,完善分区的工作也会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和方言使用状况的演变不断继续。

④方言的历史来源。方言是历史的产物。塑造方言特点、影响方言区划和亲疏关系的历史因素包括人群的地理分化、移民、语言教育、权威方言的影响和语言接触等过程。要深入了解方言特点和方言谱系,必须深入探究方言的历史及其与共同语和其他方言的历史联系。因此,正如汉语史的研究是汉语研究的重要方面,方言史的研究也是方言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方言史的研究,同时又是汉语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离不开以通语历史为主线的汉语史研究成果的参照。

方言的特点、方言的区划、方言的历史,这相互联系的三大方面,构成了方言学的主体领域,是方言学内部研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三方面实际也有程序上的逻辑路径。一般必须先有对方言特点的了解,才能基于特点对方言进行分区。而方言历史的考察,必须建立在对现有方言特点和分区的了解基础上。

人们通常理解的方言学,大致不出以上三大方面的范围。至于方言学的研究方法,则涉及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田野调查,以及对研究者作为母语人的自我调查——语法研究由于高度依赖母语人对语感的深入细致的把握,因此有许多方言语法成果是基于研究者本人的语感进行的。方言调查是获取方言事实和特点的主要途径。然后对方言特点的提炼,这往往要借助于现代方言与普通话及其他相关方言系统对比语料。材料分析、文献调查、包括古今地方韵书和方言志的调查整理、方言文学语料的收集、语音实验、词汇收集整理、跨方言对比分析、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文献和当代方言比较的互证、历史层次分析等。

方言的内向研究的成果,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如:方言概说、方言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方言专题研究著述,方言分区地图,方言特征地图,方言词典,方言音档,方言历史及古方言构拟著述,方言调查方法和工具(如语音词汇语法调查表、语音实验工具、方言整理分析软件)等。

参 方言学的外向研究

方言的内向研究,是方言研究的主体,也是方言一切研究的基础,但它不是方言研究的全部。既然“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是方言学”(詹伯慧主编,1991:5),那么还有很多不是以上节各要点为主要旨趣的研究也以方言为研究对象。它们也应当归入广义的方言学。就是那些以方言语料为材料和考察对象、以狭义方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学术需求和目标为指归的方言研究。这类研究,我们统称为方言学的外向研究。

方言的外向研究必须以方言的内向研究为基础,尊重并采纳内向研究的专业性成果。在涉及方言的特点、分区和历史的诸多方面,方言的内向研究有着专业化的优势。那种撇开专业成果自己随意取舍方言材料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常常造成材料的不确。另一方面,外向研究不但可以使方言学扩大其成果的用武之地、拓展自身学术价值,而且也是方言学在科学大网络里勾连其他学科和社会领域、获取其他学科反哺的重要连线。离开了这些外向研究,等于割断了方言学跟其他学科点的连线,方言学就可能会变得更加封闭和孤立,从而限制方言学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此外,有一些领域和课题本身处在内向和外向的交汇点上,是不分彼此双方受益的研究,例如某些方言史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因此,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根本上具有一种互惠互惠的关系。

外向型研究的常见领域和课题有很多。它们所面向的学科对象大致有四大类:语言学本体;跨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人文类学科;应用性学科。每个大类下面都有很多具体学科。下面分类择要略述。

1. 面向(普通)语言学本体的方言材料研究

这里说的语言学本体,主要是指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即以关心人类语言一般性问题、不以个别语言为限的语言学,这也是国际上大学里语言学系的主要含义。当然,个别语言学的研究只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理论意义,也都可以纳入这一范围。语言学本体又根据其子系统的不同大致分为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修辞学等学科。对普通语言学来说,具体语言材料的来源是不区分语言还是方言的。任何语言学现象只要有理论价值,其学术重要性是相同的,普通话、广州话、兰州话、徽语的黟县话、湘西的瓦乡话、英语、泰语、斐济语、祖鲁语、鄂伦春语,等等,在理论语言学中的地位是相同的,都可能为理论的构建和发展贡献有价值的语

料和分析结果。

例如,赵元任(1934)指出吴语用[ɸ]表示的浊擦音声母,实际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浊音特征,通常标写的是[ɸa][ɸe][ɸo],实际是一个开头到结尾都相同的音,而不是两个音的组合。李荣先生(1986)的短文用语音听辨实验证明温岭话的“咸淡”的录音顺放倒放听感是相同的,而这个词的常规标音是[ɸɛɹ̥ dɛɹ̥],从而证明了赵先生的论断,[ɸ]确实是一个贯穿音节始终的浊音特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音段。赵先生的这一发现,不仅指出了吴语浊声母的语音学性质,而且具有普通音位学[现属音系学(phonology)]的价值。在以英语发表的赵元任(1934)这篇国际结构主义音位学的经典论文中,这个例子说明音系中的一个辅音音段音位(用一个音标字母来表示),在语音上可以是一个与元音同起始、使元音变成气息元音(breathy vowel)的特征,显示了音系单位和语音单位的不一致。朱晓农(2010)进一步通过跨语言的研究,把这一类语音现象都归为“弛声”,属于气声大类下面的一个最常见的小类,广泛存在于南亚和东南亚语言中,朱晓农并且指出这种现象不是单一辅音或元音的音位现象,而是音节现象,它们也出现在吴语全浊声母后的元音中,还常常表现为清弛声——所谓清音浊流。这类音节现象可以归入他提议设立的音节学的范畴。这就进一步提升了这类现象的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理论价值。

再如,学者们在汉语方言中发现了大量的小称变调现象,但一般的方言研究仅限于对此作出调值的表述,有的并试图探讨这些调值的来历。朱晓农(2004)通过跨方言比较,显示大部分小称变调都跟高调有关,通过更大范围的跨语言研究,他还指出了高调与亲密范畴的生物学联系,并显示与高调有关的音段特征也有类似的功能,比如[i]类高元音。这些方言现象的研究,都超出了传统的内向方言学的旨趣,具有显著的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反过来,赵元任先生的发现,李荣先生的实验,朱晓农的解释,同时又加深了我们对吴语中所谓浊声母包括浊喉擦音的认识,对汉语方言的内向研究也有明显的深化作用。

有些方言语音现象的研究甚至超出了语言学的范围。例如,国际上有学者提出事关人类进化、迁徙和语言起源传播的假说,认为音系的复杂度会随着迁徙距离的增大而变小,非洲发源地的语言音系最复杂,向东迁徙过程中到太平洋地区(如南岛语)就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李辉和中文系的陶寰等合作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文章质疑这一观点,他们指出人类语言中单元音音位最多的方言恰恰出现在中国东部的上海郊区奉贤县金汇镇,达20个元音,总体上吴越地区元音比较丰富。他们还根据语音复杂度的大规模跨语言统计认为人类语言如有一个

扩散中心,当在里海南岸(参看《中国科学报》2012年2月16日A4版报道)。李陶文的具体观点当然还可进一步讨论,但是这一研究表明方言语音的研究可以在科学体系的很多方面发挥重要的甚至关键的作用。

句法语义方面,汉语方言富矿中当然也不乏有理论价值的研究。Bloom(1981)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详细比较汉语(普通话)和英语的虚拟语气表达,认为汉语没有英语那样的专用的虚拟语法的语法形式(If I were/was he, I would respond to that letter./If John had gone to the library, he would have seen Mary. Bloom, 1981:14)。因此,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适应假设性思维。Bloom的书引起中外学界的诸多讨论,但是这些讨论的前提都是汉语没有虚拟语气,然后讨论是否会影响到假设性思维。事实上,汉语不少方言中就有虚拟语气的专用表达形式。钱乃荣(1999、2004)描写过上海话“仔”等吴语助词表示虚拟语气的用法,邢向东(2005)、张安生(2006:337)分别描写过陕北晋语语气词“价”和宁夏同心方言语气词“吵”表虚拟语气的用法(都是属于过去虚拟语气),笔者在《语法调查手册》(刘丹青,2008:485)中简要分析了苏州话助词“仔”的虚拟标记用法和副词“蛮好”的过去虚拟用法,强星娜(2011)更详细地分析了上海话“蛮好”的过去虚拟标记用法,强星娜、唐正大(2009)分析了上海话“慢慢叫”和苏州话“晏歇”的将来虚拟标记的用法,并总结了众多方言中的虚拟标记,包括北京话表表示过去虚拟的“早知道”。例如:

上海 比方依做仔东家,亦要动气哦如果你做东家,也要生气吗?

上海 我蛮好勿要去,我懊恹去个我不去就好了,我懊恹去的。

上海 慢慢叫伊生毛病,依就开心了倘若他那天病了,你就高兴了。

苏州 耐故歇就着仔,晚歇热末再脱末哉,阿好?(《海上花列传》第18回)

神木 这场雨要早下上几天时价这场雨早下几天就好了!

同心 家里不咧来人吵家里别来客人就好了。

关中 我夜来再没去些我昨天没去就好了。

北京 早知道我早上多吃点儿啊。(《编辑部的故事》)

以上研究显示汉语包括其方言并非没有虚拟语气的表达方式,有的甚至是相当语法化的标记,有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专用于表达虚拟语气的手段,如苏州话中用于“是”后的“仔”(“是仔恹”一定表反事实的虚拟)。而相关现象和分析可以影响的领域远远超出方言学的范围,涉及到式范畴和虚拟表达及其对认知和文化的影响。面对上引研究成果,Bloom也必须要重新考虑他对汉语虚拟语气及其对民族思维的影响的观点。

再如,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一书(1998)大量引用和分析了上海话语料,但本书不是一本内向意义上的方言学著作,而是语法学理论著作。引用上海话是为了更好地显示为什么在话题优先语言里话题是一种句法成分、话题优先的语法类型能给语法体系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因为吴语是汉语中话题优先最明显的方言。同样,邓思颖分析香港粤语语气词的系列论文(如2006a、2006b、2007),也不单纯是方言语法的文章,而是形式句法的深入探讨,通过分析粤语,展示了语气词连用或与相关副词配合使用时的语序规则及其背后的句法动因。

2. 基于历史、地理、类型等跨语言视角的方言研究

语言中有很多学科都需要进行跨语言的研究,包括历史比较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或区域语言学及语言接触研究,语言类型学。对这些学科而言,每种语言、每种方言都是一份语种样本,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几乎是无关因素。在这些研究领域,研究者不在乎所引语言材料来自有语言地位的语言还是只有方言地位的语言变体。在这里,任何方言的研究成果其价值跟共同语的研究成果是等同的。

作为引发现代语言学诞生的语言学分支,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两大支柱。第一根支柱是历代文献及语料。文献主要指记录或反映当时语言实情的各种古籍,尤其是韵书、字书和古代学者的研究等,例如《尔雅》、扬雄《方言》《说文解字》《山海经》郭璞注、《切韵》等韵书,语料包括反映在古籍及出土简帛文献中的文本材料,尤其是口语化的材料,包括语音史研究特别需要的韵文资料和语法史研究特别需要的方言故事、民谣和口语对话实录等。第二根支柱是可以用来比较的当代语言方言的口语材料。对于几乎没有历史文献的语言来说,只能全靠活语言方言的调查记录材料来构拟史前语言状况。对于有文献、但是非标音文字的语言来说,语料、韵书等无法很好解决每个历史阶段的音值问题,于是,基于当代活语言的历史比较法仍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路径,而史前的语言谱系关系,更是只能依靠历史比较法的构拟。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是历史比较法用于汉语的开创之作。虽然具体构拟和结论不乏可商榷可改进之处,但是正是此书奠定了汉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基石。在高本汉及其跟随者的研究中,无一不将方言的比较作为构拟汉语历史语音面貌的必经之途。在这一学术范式下,方言材料的多寡和方言记录的质量,就成为比较研究水准的重要制约因素。目前这一过程还在朝着增量提质的方向发展。量的方面,具有大数据色彩的超大规模的方言和民族语言音系词汇数据库正在建设和扩展;质的方面,通过实验语音学同步介入的方言语音调查项目和具有国际通用性及内部可比性的方言参考语法项目正在进行,系列成果即将出版。这些方言学成果在深化我们对方言认识

(内向型贡献)的同时将直接、有力地促进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外向型贡献)。

跨方言的类型学研究。类型学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探索人类语言的差异和共性(共性就是对差异的极限的限定)的学科。在类型学研究中,方言和语言一样都是有待考察的样本语言,其作用和地位是相同的。对于方言数量众多、内部差异很大、又没有很近的亲属语言的语言来说,方言的比较在较大程度上就成为部分取代跨语言比较功能的研究方法。如 Dryer(1992)关于语序类型的经典论文中,使用了涵盖 625 种语言样本的语种库,其中汉语组的样本分别为我国台湾的普通话、香港粤语,以及马来西亚的粤语和客家话。在这种统计分析中,方言和语言的地位是相同的。前面举的语音学方面的一些研究,其实也都同时兼有类型学的性质。如朱晓农关于弛声的研究和小称变调的研究,都采用了跨语言跨方言材料。再如刘丹青(2009)讨论由正反问演变而来的重叠式是非问句,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语言共性,即来自正反问的双音词的重叠疑问句总是采用 AAB 或 ABB,不会采用 ABAB 式,并用语义贡献度解释了共性的动因:双音词重叠时其中一叠的一个音节的删除优先于语义贡献度更大的否定词的删除。这一条共性基于随州和招远官话、绍兴吴语、福州闽语、于都客家话、彝语和纳西语等语料。由于世界上这种疑问句形式非常少见,因此其共性只能在拥有这种问句的语言方言中呈现,不同汉语方言就在这条共性的发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与这些方言同一大区的方言大都没有重叠式问句,呈稀疏散点状分布的方言重叠问句显然不是亲缘或地域造成的,只能是各自独立发展形成的,因而这一共性是真正的语言共性。

方言能为语法化的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汉语方言中存在大量的语法化现象,其中有些语法化路径在其他语言中相当少见。例如,刘丹青(2005)指出由于汉语尤其是吴方言话题优先特征非常突出,对话题标记的需求很大,促使很多种类的实词性成分语法化为话题标记。而其中有些实词性成分在其他语言中很难见到语法化为话题标记的现象。语法化的研究离不开历史进程的探究,但是对于方言来说,常常缺乏共同语那样的丰富历史文献语料。因此,探讨方言现象的语法化过程,常常要在跨方言比较中获得启发,因为不同的方言语法化的进程不同,于是,历时的进程就会在共时的区域分布中留下投影,方便今人以空间探时间,还原语法化进程的全貌。例如,吴福祥(2001,2002)探讨“着、来、到、遭、去、起、了”等状态补语标记在这些词的多功能虚词链中的历时位置和演变(语法化)脉络,其主要方法就是借助方言比较的手段。这些研究所揭示的规律,其意义都不仅仅在于方言本身,而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性质。

跨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维度就是区域语言学或地理语言学,往往与语言接触现象有关。方言作为四方之言,本身就有很强的区域属性,方言研究关心区域属性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这种关注与区域语言学或地理语言学理论相联系时,就带有了外向的意义。例如,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以语音词汇语法多个层面的大量跨方言研究显示汉语所在的农耕型社会的语言方言关系有不同于游牧型社会语言的特点。再如,覃东生(2012)从区域语言学的视角来关注广西的区域性方言特点,发现有多数语义来源比较特殊的虚词及由此形成的构式,它们存在于广西境内的多个不同的大方言,包括西南官话、粤语、平话、客家话等,但这些特征和语法化现象却不见于这些方言在区外的母方言。经对照壮语的相关现象,他得出结论,这些现象都是由壮语这种最早的源头通过语言接触和模式仿制等方式逐步扩散到其他汉语方言的。这种研究为语言接触理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例证。

3. 面向人文社会学科的方言研究

语言是人类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自然带有人文性的一面,因此跟很多人文社会学科有密切的关系。

与方言学关系最紧密的社会科学就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方言,这个概念就是由方言学移植过去的。方言学研究地域方言,社会语言学研究社会方言,它们主要是一种分工关系,并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一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仍有很重要的共同点,例如都重视田野调查,都重视统计分析。此外,两者也有一些直接交汇的地方。有些区域内的不同群体是由不同方言区的移民构成的,这时,不同群体的社会方言语言差异就会表现为地域方言的差异。另一方面,很多方言有老派新派或受教育程度的显著不同,如旧常州吴语的绅谈和街谈(汪平,1988;金丽藻,2008),浙江很多吴方言中文白读的显著差异。这时,方言特色又与社会方言交融在一起。

方言的人口学研究和移民史研究,包括方言人群基因研究等。例如,周振鹤和游汝杰(1988)很早就研究了方言分区和移民类型、行政区划等历史文化的关系。平田昌司(1995)发现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改革受到方言变迁导致的南北方言差异的推动。

方言是地理区域的附着物,和地方文化特别相关。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为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语言学基础,如研究地方文学、戏曲、曲艺、民俗等,都有赖于对当地方言甚至方言历史的了解。而地域文化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会为很多方言现象的研究提供参考,特别是方言词汇,也包括一些语音现象。语言拜物教催生了一些

民俗说法:如“碎碎(岁岁)平安、年年有鱼(余)”,也导致了一些语言禁忌,如苏州歇后委婉语“么二三”(歇后“四”,谐音指“屎”);长沙因为“府正街”的“府”与忌讳词“虎”同音而在口语中改称“猫正街”,“腐乳”也改称“猫乳”(又混同为“猫鱼”)(龚义群,2013)。钱乃荣的《沪语盘点》(2002)、黄尚军的《四川方言与民俗》(2002),陈泽平的《福州方言熟语歌谣》(1998)、甘于恩主编的《七彩方言——方言与文化趣谈》等,都为方言和文化的双向研究及相关知识普及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周振鹤、游汝杰(1988)还研究了方言和戏曲及戏曲史的关系。地名学也常常涉及与区域历史和地理相关的方言研究,因为地名的由来往往有特定方言的背景,例如河南信阳的“鸡公山”,就反映了这类南方特色构词法所达到的北缘,现代信阳一带方言仍有“鸡公、鸡婆、羊公、羊婆、扁嘴公、扁嘴婆”等说法(承光山人王芳博士提供)。关于中国地名的方言背景和地方文化背景的研究,已经有一些专著,如李如龙(1998),盛爱萍(2004)等。

4. 面向应用语言学的方言研究

语言学有本体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方言学也有应用导向的研究。首先,当方言有教学需要时(参看刘丹青,2015),就有面向教学的方言研究和著作。例如,粤语作为强势方言有较大的教学需求,因此就有粤语的教学教材编写等教学类著述问世,如方小燕的《学会地道广州话》(1999)。当方言需要拼写时,除了专业人士所用的国际音标,也需要用普通字母表就能撰写的拼写法,如詹伯慧主编(2002)《广州话正音字典(广州话普通话读音对照)》所采用的拼写法。上海话也专门召开过拼写法研讨会,并在某些词典中使用了相关的拼写法。

为了方言的保护和传承,还有更多应用性工作需要及已经在展开。如方言的媒体传播,方言语料的大规模转写和典藏,方言古籍的整理出版等。当然,这些面向应用的研究,其成果也会让方言的基础研究大大受益,体现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的相互促进关系。

肆 余论

从本文分析可见,方言学的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完全是互补互惠的。内向研究是外向研究正确利用方言材料的基础和保障;外向研究不同领域对方言现象研究的深化,可能带动内向研究本身的提高和深化。内向研究不能按自身的学科目标去判定外向研究的价值;外向研究必须尊重内向研究的专业化高度和成就,不能撇开内向